

# 试析巴蜀文化中的笋形符号

严志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洪梅 (中国国家博物馆)

摘要：“𠄎”形符号流行于战国中期晚段到秦。“𠄎𠄎𠄎”形成一种固定组合，可能是一个复合性的符号“𠄎”，或者是当时流行的习语。“𠄎”形符号散布于巴蜀文化区，又在冬笋坝、宝轮院、同心村、小田溪等墓地内呈聚集性集中分布。

关键词：巴蜀符号；巴蜀图语；青铜兵器；笋形符号

## 一 绪论

在四川、重庆地区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器物上，常见一些图形符号，学界多称之为巴蜀符号。巴蜀符号器物的发现已久，70多年来，许多学者曾作过不少研究，巴蜀符号素材已积累了不少，学术界也付出了许多努力，到目前为止，虽然在资料整理、分期断代、符号的特点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的进展，但存在的问题与分歧尚有很多。

要回答巴蜀符号的性质、内容、分类、特点、规律等问题，笔者以为应当调整研究范式，先摸清巴蜀符号的“家底”，厘清每一种每一类巴蜀符号的特征、变化、组合、地域、年代，才能考虑进一步的研究与解读。运用考古类型学研究，对巴蜀符号器物重新进行尽可能细致的分期断代研究，在综合考虑这些铸刻有符号的器物，并参考共出器物，进行各种统计分析，然后分析同一器物上的符号组合规律以尝试推求其语言学特征，符号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域的分布、变化以推求符号在不同的时空维度的特征，分析符号与其载体性质的对应关系，如此也才能尝试

回答巴蜀符号的性质、内容、分类、特点、规律等问题。

经笔者初步统计，到目前为止，见于发表的巴蜀符号器物约有850件，在240余种巴蜀符号中有一类作“𠄎”形的笋形符号。本文拟对巴蜀文化中的笋形符号稍作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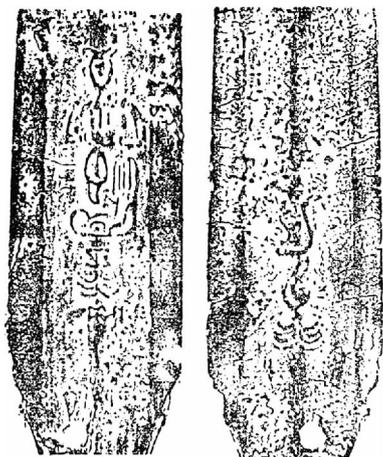
## 二 “𠄎”形符号器物的考古背景与年代推定

铸有笋形符号的巴蜀器物就笔者所见有29件。

1. 重庆市巴东区冬笋坝墓葬出土铜剑(M3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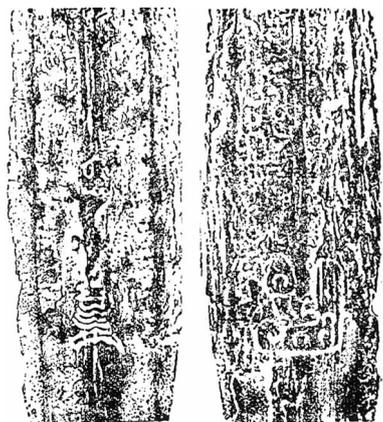
出土于重庆市巴东区冬笋坝墓葬。剑身两侧有符号“𠄎𠄎𠄎𠄎𠄎，虎𠄎”（图一）。<sup>[1]</sup>M34为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4.04、宽1.76、深0.69米。由于原报告只发表了该剑的拓片，描述为“巴蜀式”剑，从描述看应为柳叶形短茎无格剑。从墓葬平面图看，未见葬具，随葬器物以铜器为主，除剑外，兵器还有矛，容器有铜盘和陶豆各一件。笔者暂定其年代为战国中期晚段。

2. 重庆巴东区冬笋坝墓葬出土铜剑(M9:7)  
出土于重庆巴东区冬笋坝墓葬。剑身两侧有



图一 冬笋坝墓葬出土铜剑 (M34 : 2) 符号拓片

符号“  虎, ” (图二)。[2]M9 为船棺葬,长 6.64、宽 1.49、深 0.58 米,南北两边均有二层台。共出有器物 23 件,铜兵器有铜剑 3 件、铜矛 1 件、铜钺 2 件;铜容器有釜、甑、釜及盘;铜工具有削;陶器为豆和罐,还有筒瓦。葬具由可知该船棺的规格较高。器物方面,巴蜀墓中常见的铜兵器、工具、容器及陶器一应俱全。此外,还有中原风格的盘和筒瓦。从发表的器物看,铜钺为有肩式束腰圆刃,为战国中期偏晚常见形制;铜戈为无胡戈;矛为短骹式双弓形耳矛;削为直背式直柄,都表现为战国中期巴蜀器物的特点。笔者认为该墓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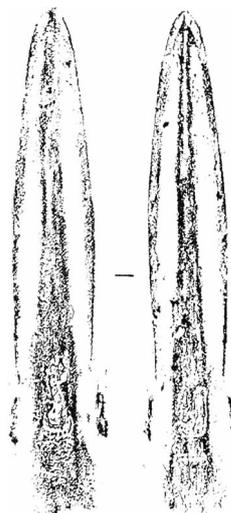


图二 冬笋坝墓葬出土铜剑 (M9 : 7) 符号拓片

### 3. 重庆市云阳县青树村李家坝墓地出土铜矛 (M43 : 3)

出土于重庆市云阳县青树村李家坝墓地。通长 19.5、叶宽 3.1 厘米。为短骹式双弓形耳矛,中脊凸隆,直达矛尖,骹部两侧有符号“虎

 ( ? ,  ” (图三)。[3]M43 墓长 3.95、宽 2.1 米,有殉人 2 个。报告定期年代为战国中期晚段,笔者从之。



图三 李家坝墓地出土铜矛 (M43 : 3) 符号拓片

### 4. 重庆市云阳县青树村李家坝墓地出土铜剑 (99 M21 :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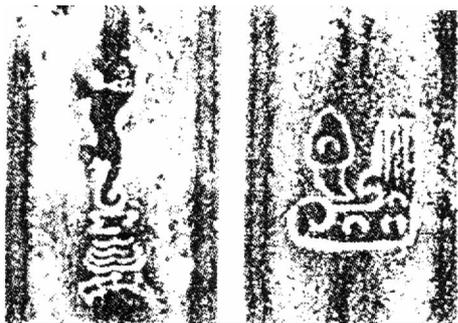
1999 年出土于重庆市云阳县青树村李家坝墓地。通长 31.5、宽 3.2、茎长 4.4 厘米。剑身上有符号“   ” (图四)。[4]M21 为长方形土坑墓,长 4、宽 2.6 米,墓底四边有二层台,随葬 17 件铜、陶器,铜器 8 件,有铜钺 2 件、戈、矛、剑、盆、刀各 1 件;陶器有罐 4 件,壶、鼎、罍、釜各 1 件。报告定期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 [5]笔者从之。



图四 李家坝墓地出土铜剑 (99 M21 : 5) 符号拓片

5. 重庆市开县云安村余家坝墓地出土铜剑 (M8: 1)

出土于重庆市开县云安村余家坝墓地。长 47 厘米。剑身两侧有符号“   虎,  ”(图五)。<sup>[6]</sup>此 M8 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 2.66、宽 1 米。随葬品有 7 件。该墓原报告定为战国晚期前段,笔者认为原报告所认为的秦文化因素的铜釜和陶釜自战国早期就存在于巴蜀墓葬中,并非秦文化因素,故该墓时代应在秦灭巴蜀之前,根据墓中所出青铜兵器和陶豆的形制特点,如剑身很长,有较宽且深的血槽,矛中脊圆缓,横断面近菱形等等,笔者认为该墓应为战国中期晚段。



图五 余家坝墓地出土铜剑 (M8: 1) 符号拓片

6. 四川广元市 (昭化) 宝轮院采集铜剑 (0: 22)

采集于四川广元市 (昭化) 宝轮院。剑身两侧有符号“   虎” (图六)。<sup>[7]</sup>该剑为柳叶形短茎无格剑,有脊,脊上有血槽,从形制上看应在战国中期晚段以后。



图六 宝轮院采集铜剑 (0: 22) 符号拓片

7. 四川彭县义和公社采集铜矛

采集于四川彭县义和公社。通长 24.5 厘米。骹部有符号“    ” (图七)。<sup>[8]</sup>该矛为短骹式双弓形耳矛,中脊凸隆,直达矛尖,一侧矛叶上有四个逗号式的镂孔,另一侧有一个“ ”形镂孔。其时代或当为战国中期。



图七 义和公社采集铜矛

8. 四川什邡市城关战国墓出土铜矛 (M10: 9)

出土于四川什邡市城关战国墓。通长 21、骹长 9.6、叶宽 2.6、骹径 2.4 厘米。骹部有一吐舌为矛脊的虎纹,虎侧有符号“ ” (图八)。<sup>[9]</sup>战国中期。M10 为长方形土坑墓,男女合葬,仰身屈肢。兵器组合为钺、戈、剑、矛;铜容器有釜、甑。其中钺的形制为圆角圆刃;矛的中脊凸出,笔者定其时代为战国中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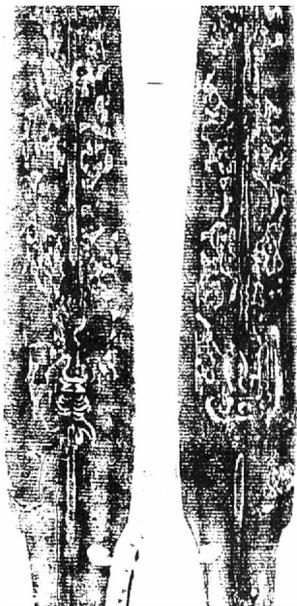
9. 四川荣经县北郊同心村墓葬出土铜剑 (M21-A: 34)

出土于四川荣经县北郊同心村墓葬。通长 36.8、宽 3.4、茎长 7.8 厘米。剑身两侧有符号“   虎” (图九)。<sup>[10]</sup>战国中期晚段。此墓 M21-A 为长方形土坑船棺墓,墓底长 6.7、宽 1.36 米。随葬陶器 30 件、铜 42 件,铁器 1 件。报告定其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该墓中出有浴缶与望山 M2<sup>[11]</sup>所出相似,所出匜与襄樊贾庄 M1<sup>[12]</sup>和江陵张家山 M201<sup>[13]</sup>所出类似,

望山 M2 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早，襄樊贾庄 M1 年代为战国中期中叶，而张家山 M201 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到晚期，结合该墓所出铜器及陶器均丰富，未见秦文化因素，故笔者认为该墓葬的年代应当在秦灭巴蜀之前，其年代为战国中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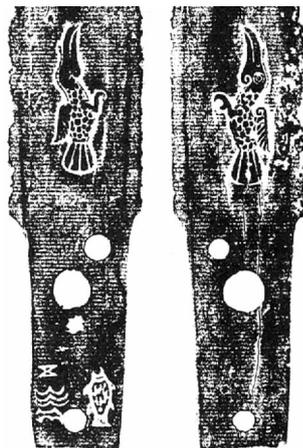
图八 城关战国墓出土铜矛 (M10:9) 拓片



图九 同心村墓葬出土铜剑 (M21-A:34) 符号拓片

10. 四川荥经县北郊同心村墓葬出土铜剑 (M21-A: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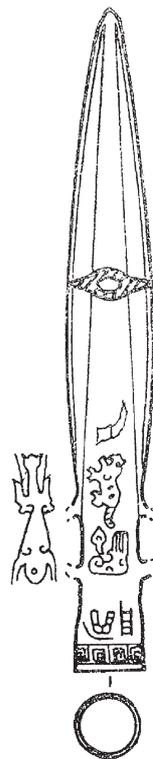
出土于四川荥经县北郊同心村墓葬。通长 25.2、宽 3.4、茎长 6 厘米。剑身两侧饰一巨喙鸟，茎本部一侧有符号“鱼    ” (图一〇)。 [14]



图一〇 同心村墓葬出土铜剑 (M21-A:32) 符号拓片

11. 四川荥经县同心村墓葬出土铜矛 (M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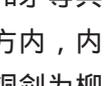
1984~1985 年出土于四川荥经县同心村墓葬。长 24.2 厘米。骹部符号不清，据摹本似为“ 虎   ” (图一一)。 [15] 该墓为长方形



图一一 同心村墓葬出土铜矛 (M1:5)

竖穴土坑墓，出有铜戈、剑和矛等兵器。铜戈为长胡二穿戈，胡末有牙，长方内，内较长，上有一圆穿。援长而直，有脊。铜剑为柳叶形扁茎无格，剑身较宽薄，饰有虎斑纹，茎部有巴蜀符号，通长 40.3 厘米。这件铜矛为短骹式双耳矛，骹两面饰巴蜀符号。中脊凸起，剖面呈椭圆形。铜斧有长方形釜口，束腰，弧形刃，上部两面饰曲尺纹。笔者认为该墓时代为战国中期晚段。

#### 12. 四川大邑县五龙乡机砖厂墓地出土铜戈 (M2: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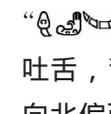
出土于四川大邑县五龙乡机砖厂墓地。长援无胡戈，下刃微内曲，中脊略凸，上下二穿，长方内中心有一心形穿。通长 19.8 厘米。援身上有符号“” (图一二)。〔16〕该墓为狭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墓圻长 4.3、宽 0.9 米，坑北端有熟土二层台，木椁长 3.7、宽 1.7、高 1.3 米，四周填白膏泥。此墓南部被盗扰，多置兵器，北部堆放陶器，有鼎、豆、釜甑等。从器物上看，铜兵器有剑、钺、戈、弩机等，其中剑最多，有三件，为柳叶形扁茎无格剑，长度在 22.8 - 30.2 厘米之间，均较短，剖面有菱形和枣核形，符合战国中期巴蜀剑的特点。钺为有肩式束腰舌形刃钺。戈有两类，分别为长援无胡戈和长胡三穿戈。青铜容器有釜和釜甑。釜甑为分体式，甑底有细长米字形算孔，釜底附三个半圆形小支。该墓有较完整的巴蜀青铜器组合，器形上看也符合战国中期晚段特点，同时该墓出有楚式细长足外撇的陶鼎。综上，笔者认为该墓时代为战国中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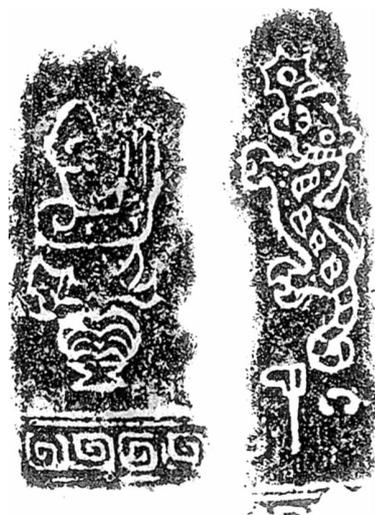


图一二 五龙乡机砖厂墓地出土铜戈 (M2: 20) 拓片

#### 13. 四川犍为县金井乡万年第村墓葬出土铜矛 (M6: 2)

1984 年出土于四川犍为县金井乡万年第村墓葬。长 22.6、骹径 2.5 厘米。骹部两侧有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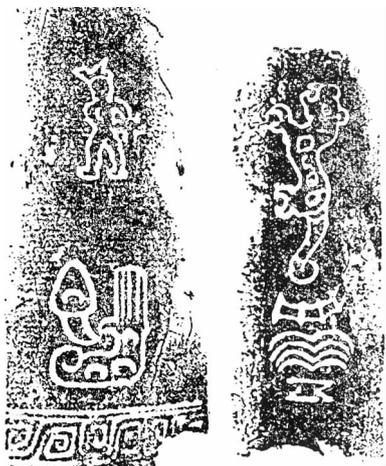
“，虎” (图一三)。〔17〕虎张口吐舌，背上有翼。M6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北偏西 62°，墓圻长 3.02、宽 2.1 米。墓底呈余坡状，东南侧墓壁下有二层台，台宽接近墓室总宽一半。随葬品集中放于两端和二层台上。该墓随葬品陶器以豆、釜为主，其次有大口平底陶罐及陶盂和钵，还有矮外撇足的釜形鼎；铜兵器有铜剑和矛；铜容器有釜甑和釜及盆；工具有斤。另外，该墓出有 4 枚巴蜀符号铜印章。铜剑为柳叶形扁茎无格剑，中脊突起。铜矛为长骹双耳矛。铜釜甑连铸，甑方唇折沿，下腹斜收，底上有对称的条形算。釜为广肩、平底、矮圈足。釜及甑上各有辫索状环形竖耳一对。铜釜甑底近平，辫索形竖耳位置较低，呈现出战国中晚期特点。另外，墓中出的陶豆有高柄豆、中柄豆、矮圈足豆，也呈现出战国中晚期特点。笔者认为该墓时代应为战国晚期早段。



图一三 万年第村墓葬出土铜矛 (M6: 2) 符号拓片

#### 14. 重庆巴东区冬笋坝墓葬出土铜矛 (M6: 8)

出土于重庆巴东区冬笋坝墓葬 (M6: 8)。骹部两侧有符号“，虎” (图一四)。〔18〕此矛为长骹式双弓形耳矛，中脊隆起，叶较窄。M6 为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 4.2、宽 1.25、深 0.5 米。随葬器物以铜器为主，铜容器有釜、釜、甑、盘，陶器有豆；另有钺 2 件，削 1 件。此墓只公布了铜矛，其余器物均未发表。从墓坑形制及随葬器物看，笔者认为该墓时代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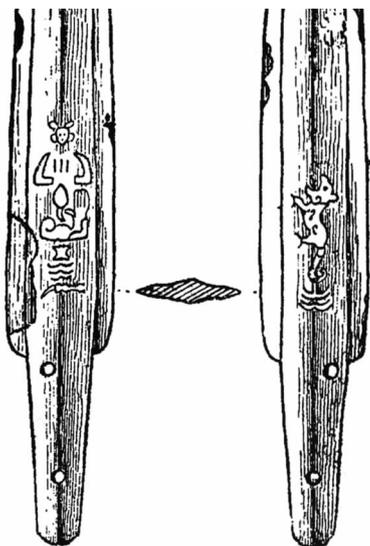


图一四 冬笋坝墓葬出土铜矛 (M6: 8) 符号拓片

能为战国中期晚段到战国晚期早段。

#### 15. 重庆市巴东区冬笋坝采集铜剑

重庆市巴东区冬笋坝采集。长 38.3、宽 4 厘米。剑身两侧有符号“   ”，虎 ” (图一五)。〔19〕此剑为柳叶形短茎无格剑，中脊隆起，从形制上看应属于战国中期晚段以后。该墓属于狭长方坑墓，除了铜剑外，该墓还出有钺、矛、削等，铜容器有釜和甑，陶器为豆和罐。此外，还有琉璃珠、带钩、笄等物。还出有 3 枚半两钱。李萍认为冬笋坝的巴蜀文化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20〕从墓坑形制和器物组合看，该墓还保留了巴蜀墓葬的主要特点，而同时出现的铁器和半两钱，表明该墓的时代已到了秦灭巴蜀之后的战国晚期。



图一五 冬笋坝采集铜剑符号

#### 16. 四川广元市 (昭化) 宝轮院战国墓出土铜剑 (M14: 3)

出土于四川广元市 (昭化) 宝轮院墓葬。剑身有符号“   虎” (图一六)。〔21〕此剑为柳叶形短茎无格剑，较宽，中脊凸隆，直达尖锋。剑身之虎张口吐舌，背上有翼。该墓发表的资料甚少，仅从登记表可知，该为船棺葬，除剑外，还有钺、削、釜、带钩，半两钱 4 枚。陶器有豆、罐、孟、盆等。另有漆盘、木梳和铁铲等。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组合看，该墓保留有较多的巴蜀墓特点，同时也有秦文化因素 (如秦半两钱和陶盆等)，李萍认为此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22〕，笔者认为该墓时代当在秦灭巴蜀之后的战国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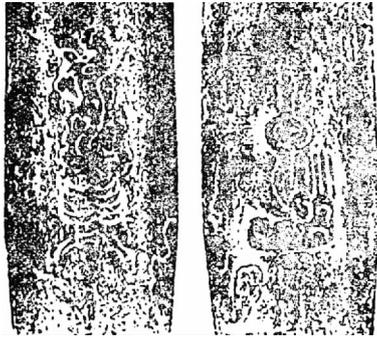
图一六 宝轮院墓葬出土铜剑 (M14: 3) 符号拓片

#### 17. 四川广元市 (昭化) 宝轮院战国墓出土铜剑 (M14: 1)

出土于四川广元市 (昭化) 宝轮院墓葬。剑身两侧有符号“  虎， ” (图一七)。〔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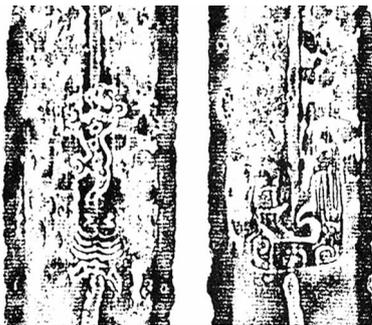
#### 18. 四川广元市 (昭化) 宝轮院战国墓出土铜剑 (M21: 2)

出土于四川广元市 (昭化) 宝轮院战国墓。残长 43、茎长 7.8 厘米。剑身两侧有符号



图一七 宝轮院墓葬出土铜剑 (M14:1) 符号拓片

“   虎， ” (图一八)。[24]此剑为柳叶形扁茎无格，茎上两穿，中脊隆起，上有血槽。M21 为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除铜剑外，还出有长骹式铜矛，中脊凸隆，剖面呈圆形，两面有血槽。此外，还出有铜带钩、铜桥形饰及石印章。石印章为覆斗状，长方形印面，印文不清，从残存笔划看，似汉字。陶器有圆底罐和折腹钵。从剑和矛的形制看，时代应在战国中期晚段以后。从汉字印面的印章及折腹陶钵来看，该墓时代已进入秦灭巴蜀之后的战国晚期。



图一八 宝轮院战国墓出土铜剑 (M21:2) 拓片

#### 19. 四川郫县红光公社独柏树墓葬出土铜矛

1972 年出土于四川郫县红光公社独柏树墓葬，长 21.8 厘米。骹部及中脊上有符号“     虎， ” (图一九)。[25]虎身躯细长，张口吐舌，背上有翼。这件矛为双耳短骹式矛，中脊凸隆直达矛尖，从形制上看，应在战国中期以后。由于该批材料为两座墓葬的随葬品收集到一起发表的，不能区分各自归属，从其余发表的器物看，有长胡三穿戈，援较平直，长方内，胡末出牙。柳叶形扁茎无格剑、有肩束腰

圆刃钺、圆形印章等战国中晚期常见的巴蜀特色器物，另外还出有一枚秦半两，充分说明这两座墓的时代为战国中期晚段到战国晚期。



图一九 独柏树墓葬出土铜矛拓片

#### 20. 古越阁藏铜剑

古越阁藏，通长 43、刃宽 4.4 厘米。剑身两侧有符号“   虎， ” (图二〇)。[26]虎出吐舌有翼。该剑为一种改装式的巴蜀青铜剑，剑身大部分保持了柳叶形扁茎巴蜀剑的形制特点，茎上也保留了一侧上一下中的穿孔。唯一有变的是茎



图二〇 古越阁藏铜剑符号

与剑身之间从流线形无格变成了剑身底部与茎首垂直的形制，这种形状正是方便做“格”，也就是它体现了从“无格剑”到“有格剑”的变化过程。该剑剑身较宽，中脊凸隆，呈现出战国晚期铜剑的特点。

### 21. 重庆市巴东区冬笋坝铜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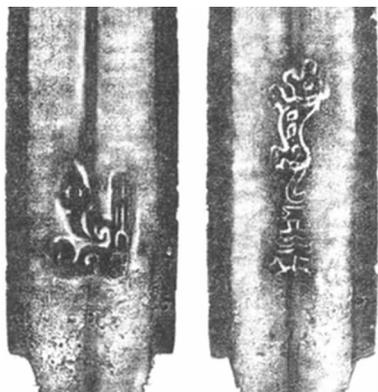
出土于重庆市巴东区冬笋坝，藏于重庆博物馆。长 50.2 厘米。剑身上有符号“虎”（图二一）。<sup>[27]</sup>该剑为柳叶形扁茎无格剑，中脊凸起，剑身较宽，茎部两穿。从剑的形制及长度来看，该剑有战国晚期的形制特点。



图二一 重庆市巴东区冬笋坝出土铜剑符号

### 22. 四川宣汉县进化村罗家坝遗址出土铜剑 (M17: 7)

出土于四川宣汉县进化村罗家坝遗址。通长 39.2、宽 3.4、茎长 6.2 厘米，剑身两侧有符号“, 虎”（图二二）。<sup>[28]</sup>该剑出土时有剑体周边有木质痕迹，可能系木匣。剑体呈柳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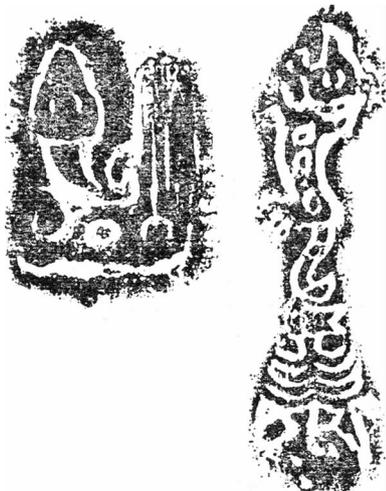


图二二 罗家坝遗址出土铜剑 (M17: 7) 符号拓片

形，短茎、茎上无穿，身与柄分界明显，两从有血槽。器身铸有虎斑纹。该剑也是属于从无格剑到有格剑的一种变化格式，与 20 号剑的区别在于茎上无穿，显然是在向有格剑的方向更近一步。从剑本身的形制看，有战国中期晚段以后的特点。M17 为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 180° 墓圪长 2.8、宽 0.68 米。墓主为仰身直肢葬，头南面右。随葬器共 16 件，陶器有 12 件，其中有豆 2 件，釜 1 件，圆底罐 1 件，网坠 8 件。铜器 3 件，釜、剑、镞各 1 件。铁器 1 件。陶豆为喇叭形圈足，是战国晚期常见的形制。陶釜圆唇侈口，溜肩鼓腹圆底。铜器里除了此剑外，还出有铜釜，侈口长颈溜肩圆底，辫索形竖环耳位置较低，也表现出战国晚期早段的形制特点。另外，该墓中还出有铁器，虽器型不明，也表明当时已进入到战国晚期。原报告认为该墓时代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笔者认为该墓时代为战国晚期，秦灭巴蜀之后。

### 23. 重庆市涪陵县小田溪战国土坑墓出土铜剑 (M1: 16)

1972 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县小田溪战国土坑墓。剑身两侧有符号“, 虎”（图二三）。<sup>[29]</sup>M1 为土坑墓，长 6、宽约 4.2 米。绝大部分文物已散失，残存随葬器物中绝大部分为铜器，还有漆器残痕。随葬铜兵器有铜剑 7 件，均为柳叶形扁茎无格剑，剑身中脊两侧有血槽，通长在 39.5~66.5 厘米之间，有战国晚期到秦的特点。钺 4 件，为有肩式束腰圆形刃钺，有战国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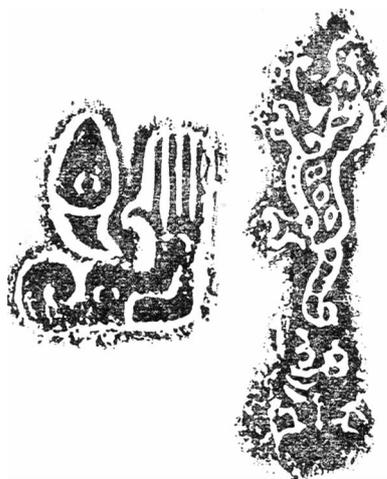


图二三 小田溪战国土坑墓出土铜剑 (M1: 16) 符号拓片

期钺的特点。此外还有 5 件戈，其中 4 件均为方内直援无胡戈，援端刃部呈圭形。铜矛 3 件，均为短骹双弓形耳式矛。弩机 2 件，均无廓，望山上无刻度，悬刀较长。胄 1 件，圆锥形中空，周边有对称的长方形孔四组 8 孔。铜容器有铜壘、铜盆、铜釜甑、铜盒、铜豆，铜工具有凿和斤。此外该墓中出土了大量的乐器，有鐃于、编钟、铜钲，还有灯台、铜勺、铺首衔环等生活用具。蒋晓春、<sup>[30]</sup>李萍<sup>[31]</sup>定此墓的年代为秦代。从器物组合看，该墓既有很强的巴蜀文化因素，也有大量的战国晚期的楚文化因素。笔者认为该墓时代应在战国晚期晚段至秦。

#### 24. 重庆市涪陵县小田溪战国土坑墓出土铜剑 (M1: 19)

1972 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县小田溪战国土坑墓。剑身两侧有符号“虎<sup>①</sup>，<sup>②</sup>虎”（图二四）。<sup>[3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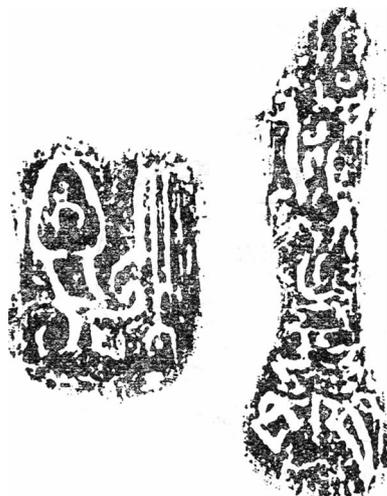
图二四 小田溪战国土坑墓出土铜剑 (M1: 19) 符号拓片

#### 25. 重庆市涪陵县小田溪战国土坑墓出土铜剑 (M1: 17)

1972 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县小田溪战国土坑墓。剑身两侧有符号“虎<sup>①</sup>，<sup>②</sup>虎”（图二五）。<sup>[33]</sup>

#### 26. 重庆市涪陵县小田溪战国土坑墓出土铜剑 (M1: 20)

1972 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县小田溪战国土坑墓。剑身两侧有相同符号“虎<sup>①</sup>，<sup>②</sup>虎”（图二六）。<sup>[34]</sup>



图二五 小田溪战国土坑墓出土铜剑 (M1: 17) 符号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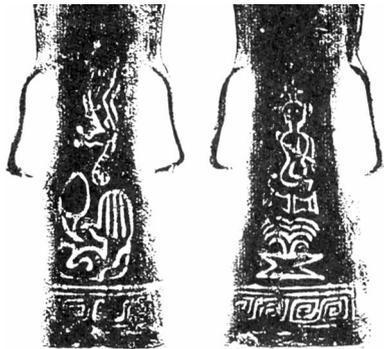


图二六 小田溪战国土坑墓出土铜剑 (M1: 20) 符号拓片

#### 27. 四川什邡市城关战国墓出土铜矛 (M61: 5)

出土于四川什邡市城关战国墓。长 21.3、骹长 7、叶宽 3.1、骹径 2.6 厘米。骹部两侧有符号“虎<sup>①</sup>，<sup>②</sup>虎”（图二七）。<sup>[35]</sup>M61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 95°，墓口残长 3.4、宽 2、深 0.4 米。未发现葬具及朽痕。骨架朽甚，仅残存东端头骨朽腐痕迹，头向东，葬式不明。随葬器物共 10 件：其中陶器 3 件，圆底罐 2 件，釜甑 1 件；铜器 3 件，矛、钺各一件，另不明器形残铜器 1 件。共出有半两钱 3 枚，正面有外廓，肉薄，背面平坦，报告认为应为秦半两。该墓陶器组合为圆底罐和釜甑；铜器均为兵器，延续了巴蜀墓葬的特点。从器形上看，铜矛中脊凸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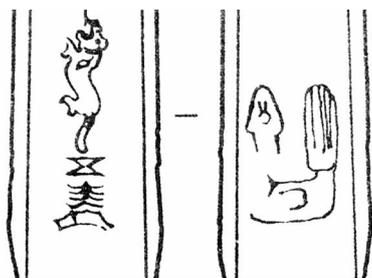
剖面呈菱形；铜钺为有肩圆形刃，都有明显的战国中期晚段以后的特点。秦半两钱的出现，更明确表明该墓的时代应在秦灭巴蜀之后，所以该墓时代为战国晚期到秦。



图二七 城关战国墓出土铜矛 (M61:5)

### 28. 湖北江陵纪南城附近出土铜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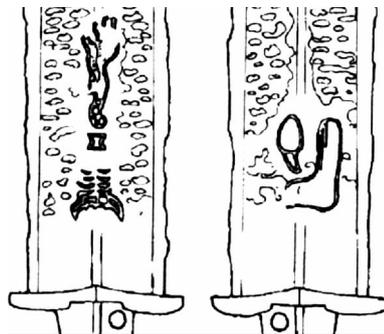
出土于湖北江陵纪南城附近。残长 27.9、宽 4.4、茎长 10.5 厘米。剑身两侧有符号“   虎” (图二八)。[36] 该剑为柳叶形扁茎无格剑，中脊隆起明显。从剑的形态及茎的长度看，该剑的原长度应在 50 厘米以上。同时出土的另一柄剑，茎首长 10.5、宽 4.6、通长 65 厘米，可做参考。考虑到巴蜀地区这种长剑多出现于战国晚期以后，笔者认为该剑的时代为战国晚期到秦。



图二八 纪南城附近出土铜剑符号

### 29. 云南水富县张滩墓地出土铜剑 (M8:16)

2005 年出土于云南水富县张滩墓地。通长 55.3、剑身长 47.9、宽 4.8、柄长 7.4 厘米。剑身两侧有符号“   虎” (图二九)。[37] M8 墓口长 5、宽 1.98 米。墓中出有墓出半两钱、舌形钺，报告定其年代为西汉早期，笔者认为定于秦代更合适。



图二九 张滩墓地出土铜剑 (M8:16)

## 三 “”符号的年代、形态、组合与族属

下文从符号的年代、与器物种类的关系、符号的方向性、符号的组合、符号与社会层级等方面讨论“”形符号的具体情况。

“”符号的年代分布范围从战国中期延至秦代，集中于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这一时间范围内。流布时间比较短暂。

符号与器物种类的关系。笋形符号“”目前只见于铜剑、铜矛、铜戈三类兵器上，其中尤以铜剑多见，占比 72%。是一种兵器专属的符号。

符号的方向性是巴蜀符号研究中的基本的问题，也是关键性的问题。“”符号的方向性到底如何，我们试着分析。从器物上的“”符号来看，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作“”形与“”形，尖端弧曲向上。二是作“”形与“”形，尖端弧曲向下。这二种形态与其所在的器物种类有密切的关系。“”与“”形出现在铜矛、铜戈上；“”与“”形只出现在铜剑上。如此，在战国时期巴蜀人的观念中，哪一种形态是这种符号的正常形态呢？从墓中铜剑的摆放位置来看，剑锋一般都是朝向墓主的脚放置，也就是说时人可能视剑锋向下为正常状态。如此，尖端弧曲向下的那一类笋形符号其实就是尖端弧曲向上的，形态与铜矛、铜戈上的笋形符号一致。巴蜀符号中铜矛与铜剑上的符号常出现反像的情况，如、等符号都有类似现象。在考虑到铜剑在墓中相对墓主的摆放位置之外，笔者以为铜矛与铜戈的摆放方式也是可以参考的标准。特别是四川大邑县五龙乡机砖厂墓地出土的铜戈 (M2:20)，其戈援上的笋形符号即作尖端弧曲向上的“”形，笔者以为向上弧曲者应该可以视为此符号的正体。至于其尖端朝左还是

朝右，笔者以为是左右无别的。出土于什邡市城关战国墓的8号铜矛（M10：9）骹部的笋形符号作尖端上竖的“𠄎”形，应该是偶然的异置。

与“𠄎”共出的符号有：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可能是其异体）、𠄎、𠄎（𠄎可能是其异体）、𠄎、𠄎、𠄎、𠄎、𠄎、𠄎。其中共出频率比较高的是：虎、𠄎、𠄎、𠄎、𠄎、𠄎。其中虎、𠄎是巴蜀符号中最常出现的符号，𠄎、𠄎、𠄎、𠄎与“𠄎”相关性更强一些。

在上举29件器中，以𠄎𠄎𠄎组合出现的有26件。其中17号器的组合因原本不清，在拓片上只观察到“𠄎𠄎”，估计很可能也是𠄎𠄎𠄎的组合，如此𠄎𠄎𠄎组合可达27件，占比93%。这样的高比例出现，笔者认为𠄎𠄎𠄎是巴蜀符号的一个固定的组合，而且三个符号的组合顺序保持一致，如果巴蜀符号构成了语言体系，则𠄎𠄎𠄎很可能就是一个固定的习语。另外，其也很可能是一个复合性的符号，即𠄎𠄎𠄎就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符号，或可将其径直摹写作“𠄎”。𠄎在8号中单独出现，12号中只有“𠄎”，有3件器中“𠄎”与𠄎共同出现。𠄎多与符号等一起出现，目前尚未见到单独出现的例子。𠄎是否与𠄎也构成复合性关系，尚难以论定。

“𠄎”符号在分布地域上观察不出随时代而发生转徙流布的趋向。𠄎𠄎𠄎的出现又呈现地域内的集中性，即同一地所出者符号组合近同。如重庆巴东区冬笋坝一带出土有5件；涪陵县小田溪战国土坑墓M1出土4件；广元市（昭化）宝轮院墓葬出土4件；什邡市城关战国墓出土2件；荥经县北郊同心村墓葬出土3件。

峡江地区的巴人一带铜器上𠄎形符号的组合表现出很明显的一致性，在14件𠄎形符号铜器中有9件的符号组合均是“虎𠄎𠄎”，占比64%。成都平原的蜀人区见有13件，其中“虎𠄎𠄎”为符号组合的例子却只有4件，占比31%。从器类上讲，巴人区的𠄎形符号铜器只见到铜剑与铜矛，且铜矛只见到2件，其余均为铜剑（占比86%）；蜀人区有铜戈、铜矛与铜剑，分别为1件、6件、6件（占比46%）。

虽然“𠄎”都出现在铜戈、铜矛与铜剑上，但“虎𠄎𠄎”组合则更经常的出现在铜剑上。13件符号为“虎𠄎𠄎”组合

的铜器中，12件为铜剑，只有1件为铜矛。“虎𠄎𠄎”的组合似乎与铜器种类有一定的相关性。

关于“𠄎”符号的族群关系问题，目前所见其器物出土地有巴东冬笋坝、云阳李家坝、宣汉罗家坝、开县余家坝、涪陵小田溪、昭通张滩；广元宝轮院、什邡城关、郫县独柏树、荥经同心村、大邑五龙乡、犍为万年第村等巴、蜀族群分布区，应该是流布于巴蜀文化区的共同符号。只是“虎𠄎𠄎”的组合在峡江地带的巴人区有更大的流传性，也更具特色。

#### 四 出有“𠄎”符号的巴蜀墓葬的比较

笋形符号𠄎与其他巴蜀符号的组合在多件器物形成了相同的符号组合，而其中一些器物的出土地点相距甚远。下文对这一现象进行考察。

第一组：符号组合为“虎𠄎𠄎”，见于16号与21号。21号铜剑出土于重庆巴东区冬笋坝、16号铜剑出土于四川广元市（昭化）宝轮院墓葬（M14：3），二器俱为柳叶形扁茎无格的战国晚期铜剑，而此阶段此二区皆已为秦所占据，此二件分别出于原巴、蜀文化区同符剑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化面貌趋同之势。

第二组：符号组合为“𠄎𠄎𠄎，虎𠄎”，见于1号与15号。这两件铜剑均出于重庆巴东区冬笋坝，两者器形稍异。

第三组：符号组合为“𠄎𠄎𠄎虎，𠄎”，见于14号与27号铜矛，唯符号中“虎”与“𠄎”位置互换。27号战国晚期至秦时期铜矛出土于四川什邡市城关战国墓（M61：5）、14号战国晚期早段铜矛出土于重庆巴东区冬笋坝墓葬（M6：8）。二者器形差异较大，但年代大体相当，也是处于秦灭巴蜀之后。M61与M6二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大小差别不大，基本上是同种类型同种规格的墓葬。

第四组：符号组合为“𠄎𠄎𠄎𠄎”，见于7号与19号铜矛。二者年代或有早晚，但器形基本一致，都是窄叶长骹矛。

第五组：符号组合是“𠄎，𠄎𠄎𠄎虎”，见于2、5、9、17、18、22、23、24、25、28、29（表一），器皆为铜剑（3号铜矛上的符号不清晰，可能也是相同的组合），年代则既有偏早



有形符号的共有 6 件，只有冬笋坝墓葬一地集中出土有 3 件，其它三件则为零星出土。结合铜器符号的组合情况来看，这三座墓的关系似乎比较亲近，墓葬规模与等级也基本一致，唯入葬时代稍有早晚。

广元市（昭化）宝轮院墓葬出土 4 件（表三）：

表三 宝轮院墓地出土笋形符号铜器对照表

编号	墓号	年代	墓葬形制	墓葬大小	随葬品	符号
6		中期晚段				
16	M14	战国晚期	船棺葬		剑、钺、削、釜、带钩、半两钱、豆、罐、孟、盆、漆盘、木梳、铁镞	
17						
18	M21	战国晚期	土坑墓		剑、矛、带钩、铜桥形饰、石印章、圆底罐、折腹钵	

宝轮院墓葬在 1954 年与 1995 年二次共发掘了 24 座墓，发掘报告没有刊布的宝轮院墓葬的具体大小，从 1995 年发掘的报告提供的平面图来看，宝轮院墓葬也是由东南—西北向成排分布，墓葬的规模基本相仿，等级差别不明显。M1 与 M21 分处已发掘墓区的西南与东北隅，相隔较远，体现出二者关系并不亲近。宝轮院墓葬出土的 4 件形符号器物的符号组合似乎暗示着“虎”与“虎”是等价的，也即在这个组合中，“”或许可以省略也能表达相类似的含义。

荣经县北郊同心村墓葬出土 3 件（表四）：

表四 同心村墓地出土笋形符号铜器对照表

编号	墓号	年代	墓葬形制	墓葬大小	随葬品	符号
9	M21-A	中期晚段	土坑船棺墓	6.7×1.36 米	陶器 30、铜器 42、铁器 1	
10						
11	M1	中期晚段	竖穴土坑墓		戈、剑、矛	

同心村墓葬经 1984 年底至 1985 年 1 月广播电视局大楼工地与 1985 年 11 月至 1986 年 5 月汽车队址与县政府宿舍工地二次发掘，前者发掘墓葬 6 座；后者发掘墓葬 26 座。但发掘报告中没有交待这些墓葬的相互关系。根据第二次发掘

刊布报告的墓葬平面图<sup>[38]</sup>可知这二处发掘地点其实是同一处墓地。这批墓葬也当是东西成排分布的。荣经同心村发表发表有墓坑数据的墓葬 23 座，可分为三个层级：3 米以下的第一级墓 1 座；3~6 米间的第二级墓 18 座；6~10 米间的第三级墓 3 座。其中的 M21 是此墓地中墓坑最长的墓葬。M1 所出的 11 号铜矛上的符号只见摹本，笔者对其是否确为形符号还有些疑虑。如果不将其考虑在内的话，由同心村墓地所见出有形符号的墓葬便只有规模等级最高的 M21 了。考虑到荣经同心村在巴蜀文化区中地域上偏南的位置，笔者以为这二件器可能是由北部的巴蜀文化区流入的。

涪陵小田溪战国土坑墓 M1 出土 4 件（M1：16、M1：17、M1：19、M1：20）。小田溪墓地自 1972 年以来共有 5 次发掘<sup>[39]</sup>共清理墓葬 22 座，发表材料的有 20 座，其中战国至秦时期的墓葬 18 座。在这批墓葬中，M12 的规模最大，其长 7.9、宽 6 米。但具体材料未公布，学界认为是巴文化中“王”级的墓葬。另外，小田溪墓地 M1 的规模也很大，墓坑长约 6 米、宽 4.2 米（其它 16 座墓的墓长都在 3 至 4 米，宽在 2 米左右），随葬器物数量众多，其中还有成组的编钟，显示出 M1 与 M12 在小田溪墓地中处于最高层级。小田溪战国土坑墓出土的带有形符号的铜器都是铜剑，皆出自 M1，其中 23、24、25 号铜剑符号组合完全一致，皆是“虎”；26 号铜剑剑身两侧皆是“虎”，较其它三剑多了“”。而“”与“”在小田溪墓地中也仅见于 M1（M12 的材料目前未公布，是否有这类符号组合不清楚），笔者以为形符号当不会是小田溪墓地入葬者的族群性名号。但小田溪墓地与同心村墓地中形符只出现在墓地中等级最高者的墓中，显示出一定程度上的专属性与独占性，而且数量不止一件，这一现象还是值得注意的。

## 五 结语

综上，形符号流行于战国中期晚段到秦，是流行时间较短的一种符号。“”形成一种固定组合，可能是一个复合性的符号或者是当时流行的习语。这类符号只见于铜剑、矛等兵

器上,在大的地域分布上散布于巴蜀文化区(在巴人区的分布稍广),又在冬笋坝、宝轮院、同心村、小田溪等墓地内呈聚集性集中分布。就巴蜀文化范围内来看,笋形符号不具备族群性或等级性的特征,但在同心村、小田溪墓地中则又呈现出一定的专属性。

注释:

- [1]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49页,文物出版社,1960年。
- [2]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50页。
- [3]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274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 [4]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重庆市云阳县文物管理所:《重庆云阳县李家坝巴文化墓地1999年度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7辑,第461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 [5]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重庆市云阳县文物管理所:《重庆云阳县李家坝巴文化墓地1999年度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7辑,第478页。
- [6] 山东大学考古系等:《重庆开县余家坝墓地2000年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3年第4期。
- [7]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39页。
- [8] 四川省博物馆编:《巴蜀青铜器》,第125页,成都出版社、澳门紫云斋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
- [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244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 [1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50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 [1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第132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 [12] 王先福等:《湖北襄樊市贾庄发现东周墓》,《考古》2005年第1期。
- [13]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201号楚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 [1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50页。
- [15]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四川荣经同心村巴蜀墓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1期。
- [16] 四川省文管会、大邑县文化馆:《四川大邑五龙战国巴蜀墓葬》,《文物》1985年第5期。
- [17]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犍为金井乡巴蜀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90年第5期。
- [18]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44页。
- [19]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37页。
- [20] 朱萍:《楚文化的西渐》,第97页,巴蜀书社,2010年。
- [21]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38页。
- [22] 朱萍:《楚文化的西渐》,第97页。
- [23]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51页。
- [2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07页。
- [25] 李复华:《四川郫县红光公社出土战国铜器》,《文物》1976年第10期。
- [26] 王振华:《商周青铜兵器》,第87号,古越阁,1993年。
- [27]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第38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 [2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宣汉罗家坝》,第86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 [29] 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
- [30] 蒋晓春:《试论涪陵小田溪墓地的分期与时代》,《江汉考古》2002年第3期。
- [31] 朱萍:《楚文化的西渐》,第132页。
- [32] 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
- [33] 同[32]。
- [34] 同[32]。
- [3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219页。
- [36] 杨权喜:《江陵纪南城附近出土的巴式剑》,《江汉考古》1993年第3期。
- [37] 昭通市文物管理所、水富县文化馆:《云南昭通水富张滩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9期。
- [3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13页。
- [39] a.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  
b.四川文管会、涪陵地区文化局:《四川涪陵小田溪四座战国墓》,《考古》1985年第1期;  
c.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涪陵小田溪9号墓发掘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第191页;  
d.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局:《涪陵小田溪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第1339~1376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